



赵子明：历经磨难 信念如磐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字鲁泉，中共党员，山东省寿光县人。幼时在私塾读书，兼以农耕生产。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1917年闯关东，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欺压，遂返回家乡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8年，由于军阀混战，当地闹灾荒，赵子明随大批山东移民迁到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谋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先经同乡许大可出资开设“鲁大药房”，继之倡导开荒植树，后又开设“内山书店”，积极销售进步书刊，广泛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很快跻身当地“知名人士”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子明在临河县组织救亡团体，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爱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重视。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派孙景绪、王森等5人到临河做兵运工作，即将赵子明的药房作为联络点，并吸收他列席各种会议。同年4月，王森介绍赵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河县街道支部书记。从此开始，在党的领导下，赵子明发动当地山东移民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使500多户移民得到了土地；组织菜园子公会，同国民党驻军的白吃白拿行为进行斗争，迫使驻军团长下令公平买卖；另设“光化药房”作为党的活动据点，使党的组织与“鲁大药房”分家而更加隐蔽和安全；成立派报社，陈列、销售各种进步报刊，吸引驻军官

兵阅读，宣传进步思想。经过1年多的努力，赵子明在地方和驻军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创了党在临河的工作局面。

1934年初，赵子明转移到宁夏银川市开展建党工作。他以开西药房和行医为掩护，很快与王森、李云清、李德铭、张春申4人建立了“中共宁夏工作小组”，同时将雷鼎三、严有年发展为党员，并派李云清打入敌人心脏，担任马鸿逵公馆英文教师。工作正在顺利开展之时，因李云清写信不慎暴露了组织，赵子明和李云清、雷鼎三等被敌捕获。在狱中，赵子明坚贞不屈，受尽酷刑折磨，但始终未暴露党员身份，敌人无奈只得将他关押2年后取保释放。

1936年2月，赵子明从银川转至兰州，先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身份作掩护，开设“兴陇派报社”“大公报分销社”，经销各种进步报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和尹有年加入进步群众组织“同仁消费合作社”，广泛结交社会进步人士，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在五泉山卖报，赵子明向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宣传“娱乐不忘救国”。“双十二事变”后，报纸的买卖做不成了，赵子明又和尹有年商量办起了豆浆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代表，于7月7日离开延安，29日抵达兰州。也在此时，党又派曾在兰州担任过中共甘宁

青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来兰州负责筹建甘肃党的工作机构。孙作宾到兰州后，首先通过共产党员王子勤恢复了赵子明的组织关系，并通过他发展尹有年、贺进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26日，中共兰州工作委员会成立，赵子明担任了工委事务秘书，奉命继续在黄花园经办豆浆店，作为工委秘密联络点。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赵子明和尹有年在“同仁消费合作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大批热血青年中发展党员，安排进步青年去边区参加革命。同时，他还把“同仁消费合作社”建为党的又一个活动据点。与此同时，他还派骨干社员加入各救亡团体，为掀起兰州地区抗日救亡高潮，进行抗日募捐，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3月，党派罗云鹏到兰州，兰州工委改名为甘肃工委。这时，赵子明负责工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和其他文件的印刷工作。期间，他曾3次转移地址，先用油印，后用石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这年8月，赵子明协助郑重远组织和领导愤怒的水伙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同时包围警察总局，迫使当局撤销了“集训”计划，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党员，组织起群众性的“兄弟会”，进一步加强了水伙工人的团结。1939年5月，为了给党的负责人寻找职业作掩护，赵子明在周家庄5号开办了一

陕甘宁边区的义仓合作运动

张清益首创义仓

新正县三区一乡雷庄村村长、共产党员张清益是创办义仓第一人。张清益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受磨难，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动员群众、组织开荒队，支援革命。1936年，东北军“围剿”关中苏区，新正县全境丧失，张清益领导的乡被占领，他坚定不移地坚守工作岗位，在村里办起一所小学，选派一名地下党员为教员，他自己任管理员，两人把学校作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秘密活动的联络点。为掩护干部、搜集传达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张清益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号召，组织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当年新正县开荒地5300多亩，他所在的三区名列全县前茅，受到表彰。1941年，张清益担任新正县合作联社主任。因为自己遭受过许多痛苦，所以他时常为穷人着想。1942年，在农民大生产的热潮下，张清益提出了开义田、办义仓，防灾备荒，支援抗战的建议，经请示县委，得到时任县委书记史梓铭的赞扬和鼓励，村民大会也顺利通过，决定全村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力，为义仓出工5天。1941年初，全村开义田20亩。到了3月，全村32个劳力开义田25亩，当年收义粮4石，翌年春，用义仓粮解决了部分缺粮农户的春荒。为了扩大义仓范围，张清益多次公开讲演，介绍雷庄义仓的好处和经验。他在开荒耕种时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并负责把义田所获粮食收入义仓，秋后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义仓粮食。

张清益总结创制了5条具体管理办法：(1)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能借出。(2)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秋后不得借出。(3)参加义田者，借粮一斗，加利一升，不参加义田者，借粮一斗，加利三升。(4)丰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俟年头转好交还。(5)不务正业者，吃烟要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这5条办法简便易行，切合实际。首先，规定了借粮的时间和具体办法。有丰、歉年之分，一年之中又分为青黄不接及秋收时节，既突出了义仓防灾备荒的功能，又保证了义仓的积蓄。其次，对借粮对象区别对待，公平合理，杜绝了吃大锅饭的现象。既鼓励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又教育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最后，义仓设生产、管理委员会两个临时机构，分别负责生产和管理，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借粮经过两道程序，先由义仓管理委员会通过，再经村民大会讨论批准，具有很强的透明性和民主性，使义仓运动更加完善、趋于成熟。

义仓在陕甘宁边区的推广

新正县雷庄村义仓的成功创办，如一粒火种，由村而乡，由乡而区而县，在短短一两个月就燃遍了全关中。据统计，1944年5月新正县一县就组织开荒班子148人，搭工组366个，共开义田1300多亩。关中分区四县大部劳动力都参加了义仓合作运动，到1944年6月下旬新正县共开义田1900亩，开荒1620亩，建议仓29处；淳耀县开义田500亩，开荒1100亩，建议仓43处；新宁县开义田1300亩，开荒1100亩建议仓43处。

义仓在关中分区的成功普及引起了边区政府的重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议会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员任绍甲、杨正甲、白文焕、高崇珊等人提出在陇东分区及靖边县创办义仓以备灾荒案，陕甘宁边区在发给各专员县长的命令中，明确指出“创办义仓以备灾荒案、当经决议并通过实行。”“为防患未然计，各级政府应积极引导人民创建义仓，积蓄余粮以备万一”，并指出“采取关中义仓运动经验，造成群众备荒运动”。边区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广义仓，对义仓的充分肯定和对防灾备荒的重视可见一斑，甚至把它提高到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准备的高度，并授予创办者张清益特等劳动英雄的殊荣。

义仓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义仓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们将陕甘宁边区看作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屡屡制造摩擦，蚕食、进攻边区属地。

1941年、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主要兵力向边区疯狂进攻，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批劳动力被屠杀或抓走，牲畜、粮食被掠夺；国民党当局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边区军民。新正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保卫边区的前哨阵地。驻正宁县的胡宗南部队在毗邻地区不断制造摩擦、蚕食进攻，1939年以来，他们积极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由蚕食转为大举进攻，并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妄图扼杀革命政权。新正县又是安置移民重点县，难民大量迁入，粮食问题更为严峻，尤其是每年青黄不接时，部分群众发生断炊现象。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正县积极响应，义仓合作运动是大生产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义仓的历史意义

义仓的创立与推广，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大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义仓合作运动是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展的产物，是当时边区经济建设和对敌斗争的一项重大举措。一方面大量荒地被开垦，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有效地组织了闲散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安置了大量移民，救济了部分贫民，扩大了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队伍，对边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影响深远，并为此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义仓的创立，保障了边区的粮食安全。在当时农业因战争和灾害的破坏而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是头号大事，生产被边区政府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义仓合作运动响应了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方针，以创新的形式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提高了边区人民抵御灾难的能力和共渡难关的勇气，增强了边区人民的凝聚力。可以说，义仓合作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抵御日寇野蛮掠夺和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利器。

义仓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民谋福利的一项善举。共产党员张清益以其大公无私的胸怀、勇于创新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普通党员的时代价值，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感召力。义仓的创立与推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人民在敌人的封锁和灾害面前毫不气馁、毫不畏惧，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体现了党和边区人民防灾备荒、济贫扶困的远见卓识。

（据《团结报》）



1939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这些文娱活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

秧歌文娱 振奋精神

1943年春节，曲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欣喜若狂，笑逐颜开。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人民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毛泽东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毛泽东又说：“这也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的重任，出演周而复、苏一平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

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周恩来捎信给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刘顺清》、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写的《红布条》、张季纯写的《保卫和平》、杨静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的《边墙上》、萧汀、方太写的《回娘家》等，各具特色。据统计，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就有400多出。

陕甘宁边区兴起群众性的秧歌运动。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10月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有9位群众秧歌队代表介绍了典型经验。不久群众秧歌队举行联

演，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的《跑红灯》，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的《减租》，拓开科的《练子咀《闹官》，民间艺人李卜的《张瑞卖布》等，展示出群众文艺的壮观场面。

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艺界有35名获奖者。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那时，不仅陕甘宁边区秧歌歌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歌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交际舞会 温馨甜蜜

秧歌文娱是陕甘宁边区军民振奋精神的娱乐方式，交际舞会则是军民增进友谊的又一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延安的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来有青年带头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步’。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步、四步，还会探戈。刘少奇同志不会跳舞，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但还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儿，他也能踩着鼓点不动意思的舞步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思跳，被大家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时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看，跳死了算！’延安的条件差，食堂就是舞场，音乐伴奏就是民族音乐伴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谈过延安舞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斯特朗描述了延安舞会上的4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

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坚实而敏锐，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感。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会机械地跟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必须特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的暗示转动。不过，只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他终究会使你感到悠然自得”。“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起舞。他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就会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这位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恩来这个一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在开始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后，他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当晚会即将结束，你累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旧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

美国人马海德说：“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色閃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她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一怀念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

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

体育活动也是军民娱乐的形式之一。那时陕甘宁边区虽然条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掀起了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美潮。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人马海德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在文章中说，“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体操。午间，篮球、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写道：“延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做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边，都可以欣赏到男、女孩子们的仰泳、蛙泳、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冰鞋就可以滑冰了”。条件简陋，民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燕斌谈到，“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板，木板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补了再补，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弄个新的来。”

诸多运动中，延安军民最喜爱、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排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曾轰动一时”。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八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队联队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八路军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奔跑争抢。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的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把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丰富边区军民的文娱生活。

（据《民主协商报》）